

## 文苑笔谈

# 座右铭，一定要放在右边吗？

刘绍义

几位朋友来我处小坐，其中一友见书房两副对联“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和“养它七八盆名贵花时常松土修剪枝浇浇水；邀上五六位知心友一起喝茶举酒杯聊聊天”，问我哪一副是座右铭。另一友忙接过去说：“座右铭都是写在座位右边的，这对联都是座右铭。”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座右铭来，几个人争执不下。其实，他们说得都有道理，座右铭的确是写在、刻在、贴在座位右边的，但后来不是写在这个位置的，只要能起到励志、警示等作用，也可算作座右铭。例如林则徐为了使自己怍急的心情有所克制，就亲自写了“制怒”二字挂到墙上，这依然是座右铭。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并没有刻在座右，朱自清的“既是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压在书桌玻璃板下的。“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只看花”“非关须臾力为善，不计功名始读书”“士所尚在天，行远登高，万里鹏程关学问；业必精于勤，博闻强识，三余敏木惜光阴”等，这些有名的座右铭，都是挂在墙上的。

是的，最早的铭言，是写在座位上不错，但它一般是四句，前后左右都有。如《大戴礼》上说，周武王座席上，前后左右都有铭言，席左端铭言是“安尔必敬”，席右端铭言是“无行可悔”，后左端铭言是“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铭言是“所鉴不远，视尔所代”。但汉末魏晋时，铭言置于座右之风，已经盛行，这也是个事实。东汉人崔瑗就曾经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题目就叫《座右铭》，可见当时铭言写于座右，已经约定俗成了。那时候，不但俗人家有座右铭，僧道中也流行这种风气了。南朝梁慧皎在《高僧传·支道》中就说过：“僧百余，时或有情者，道乃作座右铭以勸之，曰：‘勸之，勤之，至道非弥。’”可见当时座右铭流传之广了。

据传，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送给徐达一只“公道杯”。当时开国元勋徐达自恃功高，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日日饮酒，夜夜笙歌，政务不理，牢骚满腹。有一天，朱元璋赐给徐达一只瓷质酒杯，徐达如获至宝，可用起来耐人寻味。把酒倒入瓷杯，如不超过一定限度，则滴酒不漏，一旦斟满了，就滴酒不存。徐达握着酒杯幡然醒悟，明白了朱元璋的良苦用心，一劝他不要贪杯，二劝他不要自满。所以，“公道杯”又叫“莫贪杯”。

“公道杯”是检验倒酒人公道不公道的衡量尺度。漏酒的奥秘就在于杯中的龙头上，底下的小空眼与龙头形成“虹吸”现象，过量则流，不满则存。这只“公道杯”做工精良，瓷质上等，釉色均匀，整个杯子看不出一点玄机，是“公道杯”中的佳作。这种杯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成功率极低。因为瓷器一旦烧成，差一毫米不是不漏就是乱漏。要烧一只完美无缺的“公道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句俗语说得好，“九天一龙，百日一杯”，足见其难。现在我国仅江西历史博物馆珍藏一只明代复制宋代的真品，其他地方还没发现有古代的“公道杯”存在。

“公道杯”是对“满招损，谦受益”最好的注释。唐人孔若思曾经在座右置止水一石，言明自己“仕宦至中足矣”。如今在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陈列室，有一种叫敬器的汲水器，也是古代庙堂置右为成的器物。它是古人利用力学原理做的一件日用品，意在说明“满招损，谦受益”的辩证道理，其作用应该和“公道杯”大同小异。

是的，“座右铭”就是刻在座位右边用来鞭策自己的铭文，或者是指写在座位旁边，作为警戒、提醒用的有益的话。但在很早以前，“座右铭”又的确是一种被人们称为敬器的酒具。

深究下去，“座右铭”源自仰韶文化的一种带双系圆锥状的盛水陶器，古人用它从深井中打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陶器就演变成了一种带双耳的青铜容器。这种容器非常特殊，它空着的时候呈倾斜状，装上适当的水就自然转到正位，一旦装满水，又会倾覆，水全都洒出来，滴水不留。有点类似现在的“公平杯”“不满杯”等。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非常喜欢这种敬器，常常把它放在座位右边，以警戒自己不要骄傲自满。齐桓公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给他建庙时，在庙堂之上也置放了这种器物。

有一天，孔子率弟子到齐桓公庙里朝拜，见到了这种器皿，不知道是何物，问庙里管香火的人，才知道这就是敬器。孔子虽然没有见过敬器，但知道敬器的名字和来历，便当场给弟子讲了当年齐桓公置敬器于座右警戒自己的故事，并告诉弟子，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骄傲自满必然会招来损失。南北朝时，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也曾为齐武帝儿子萧子良做过一个敬器，做得也非常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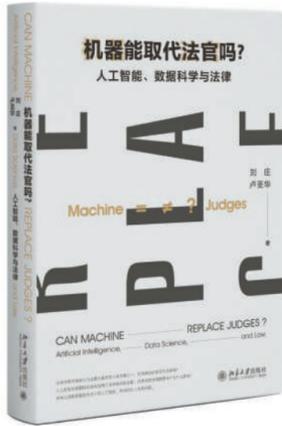
后来，这种敬器就失传了，人们改用铭文代替敬器放在座右，再后来就直接把文字刻在自己的座位右侧，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南朝梁萧统《文选·崔瑗座右铭》吕延济注：“瑗兄璋为人所杀，瑗遂手刃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还有白居易《座右铭》序曰：“崔子玉《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行，常书屋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云。”

一些名副其实的座右铭，今天我们都常用到，如“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悔读书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名言也都曾经作为座右铭来激励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心中犹疑，需要外物的加持，这就是座右铭的作用。如果目标明确、内心坚定，这种外在之形自然消弭无踪。

## 书评

# 对法律人工智能，我们能期待什么？

王水明



《机器能取代法官吗？——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法律》

在法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逐渐走入法律界的今天，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需要检索类案，找AI；需要撰写法律文书，找AI；甚至遇到法律难题，也可以找AI……然而，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对于法律人工智能，我们到底能期待什么？对此，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不了解这一领域令人兴奋的前沿进展，也不能听风就是雨，盲目相信。带领读者了解这个领域，维持大家心态的谨慎乐观，或许就是香港大学学者刘庄、浙江大学学者卢圣华联合所著的《机器能取代法官吗？——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法律》一书的目的吧。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介绍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在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的书籍，该书整合了国内外前沿的业界实践和学术研究，是对该领域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和提炼的最新成果，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在法律领域应用的全面图景。

现实生活中，数据无处不在。以法律场景为例，合同文本、证据材料、判决书、庭审记录等，都可以以数据的形式记录和呈现。具体到数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前者如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涉及的案件情况，包括案件号、公诉机关、被告人、犯罪类型等，后者如文本、语音、图像、视频等。而我们所称的大数据，则必须具备“4V”特征，即大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与高价值性。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如何管理和利用数据是一种重要能力，这就涉及数据分析——运用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收集和分析数据以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甚至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就是数据科学的重要目标。

只有了解了数据，才能讨论人工智能。所谓人工智能，就是利用计算机或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来模仿人类完成理解、思考、推理、解决问题等高级行为。这里其实指明了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具体来说就是机器学习与专家系统。这两大类型人工智能，对应了两类人类智慧——归纳和演绎，即从经验中总结规律及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两类能力。谈到机器学习，它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如自动化刑事判决，这里我们可以以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为依据，建立一个量刑系统，张三杀了人，我们将这一案件事实输入系统，系统将自动给出判决结果——死刑。

就人工智能本身而言，数据和算法构成了核心内容，其中数据是基

础，算法是关键。该书介绍了如下算法：第一种算法是决策树模型。所谓决策树模型，是一种最基本的树模型，它的任务是对类别进行预测。为了检验决策树模型的应用效果，作者以预测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为例，先收集某自然任期内的628个判决，选取六个要素如案件上诉、申诉人类型等作为特征，选择格鲁特诉布林格案为具体例子，结果显示，决策树模型对法官的预测，准确率与法律专家相近。可见对于法律从业者 and 案件当事人，机器在速度、效率、成本等方面，比人类决策有一定优势。

第二种算法是回归模型。具体来说，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实现对连续变量的预测，而逻辑回归模型可以对类别变量进行预测。前者类似于线性方程，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数据分析和预测中，后者应用于如何解决分类问题，如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分类、根据案件信息预测被告人是否会被定罪等。比如以预测盗窃案件中的刑期（连续变量）和缓刑（类别变量）为例，先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2014年至2020年全国330286个盗窃案件的裁判文书，然后提取案件的关键要素，确定盗窃金额、是否为入室盗窃、是否为累犯等自变量，再以上述因素为自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构建模型时，通过测算回归系数、p值等即可预测结果，即盗窃金额和入室盗窃这两个因素与刑期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也就是说，盗窃金额越多、案件具有入室盗窃情节，那么刑期就越长。

与前两种算法以确定的变量信息为基础构建模型不同，聚类算法要对数据进行分组但并没有确定的结

## 影评

# 让尊严有处安放

晴风



印度电影《因果报应》剧照

最近登陆中国院线的印度电影《因果报应》讲述了一个集悬疑、犯罪、动作又不失温情的故事。主线是父亲复仇记，剧情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让观众在紧张刺激、引人入胜的情节中，体会到天道轮回、恶有恶报的快意恩仇。同时，从主人公以一己之力找回自身尊严的故事中，我们得以一窥印度社会的现状与困境，并由此感受印度电影人的执着与勇气。

电影翻译成“因果报应”似乎契合了中国普通观众的思维习惯，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父亲的寻找正义之路。影片在刚开始就用一场戏塑造好一位父亲的形象：他性格倔强且力大无比，女儿被误解遭到学校的惩罚，父亲反抗的方式是双手握住办公室里的柱子，直到房屋都要坍塌仍然不放手，只为给女儿要一声道歉……

### 1.

从没有哪部电影，让我在大屏幕上看到如此多的耳光扇在人脸面上，虽然我知道他们是演员，这是为了剧情需要做出的牺牲，但我知道他们扮演的正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这些耳光打得如此肆意妄为、清脆响亮、毫无缘由，让身为观众的我大为震惊，更为其暴露出的印度底层民众生活现状感到窒息和同情，其中三个耳光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第一个耳光是校长打在中学生脸上的耳光。主人公玛哈拉贾是位理发师，和女儿乔蒂相依为命。有一天，乔蒂被校长喊到办公室训斥，原因是校长误认为乔蒂在行政官员的饮料中掺了酒，得罪了行政长官，致使这所学校排名进不了前十。在没有做任何调查的前提下，自大傲慢的校长根本不听乔蒂解释，勒令乔蒂转学，并要报警将玛哈拉贾抓起来坐牢。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老师找到了真正的始作俑者——乔蒂的男朋友。校长顿时觉得颜面扫地，勃然大怒，突然将一记耳光打在了这个男生脸上，被打的男生始末没敢抬起头反驳或抗争。

且不说男生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校长可以随意掌掴学生吗？众所周知，打耳光是一种人身侵权行为，更对他人精神造成极大侮辱。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禁止体罚学生。体罚包括教师对学生肉体实施惩罚并使其受到伤害的行为，如殴打、罚站、罚跪、罚抄、罚写等。面对富商的肆意辱骂、殴打，四下竟无人站出来反驳或反抗。

这记耳光折射出了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下，印度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现状。有关资料显示，印度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45上涨至2013年的51，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在印度，1%最富有的人口控制着全国40.1%的财富。此外，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根据世

界银行数据，印度有830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之下，是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基础设施匮乏、社会歧视严重等在影片中可见一斑。平民居住在脏乱差的市井小巷，房屋破旧、田地荒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级官员家中富丽堂皇、金碧辉煌。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了打人者不可一世、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穷人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打耳光还不过是较轻的人身侵权行为，当民众受到更为严重的人身财产侵害后，该怎么办？找执法者主张权利有用吗？影片中第三个耳光给出了答案。玛哈拉贾去警局报案，请求警方对家中被偷窃的一只垃圾桶立案，因为这只垃圾桶对他们父女而言意义非凡——在一次突发车祸中，这只垃圾桶救下了他女儿性命，相当于父女俩的“保护神”。但是，警官认为玛哈拉贾为了一只价值350卢比（相当于人民币30元）的垃圾桶，却要他耗费大量警力去寻找，无疑是在戏弄他。于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玛哈拉贾脸上。玛哈拉贾对此并未感到羞辱或有抗争意愿，毫不在意地转身走了。

警察是一线执法者。在任何国家，警察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影片中执法者公然违法，毫不在意自身形象，对民众盛气凌人地欺压，和心照不宣地“索贿”，比比皆是。在警局，警察可以对小偷私下用刑，无需交由法庭审理；小偷视“私刑”为家常便饭，自觉配合警察；破不了的案件，警长可以找刑满释放的罪犯“顶包”，只需给点“好处费”……

真相与正义何在？如何让警方高速有效地破案？玛哈拉贾不惜悬赏70

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5.8万元），要求警方寻找丢失的垃圾桶。警方从中嗅到商机，出动警力全城寻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了尽快拿到赏金，警察局局长派人去买垃圾桶，要求工匠打造得和玛哈拉贾被窃的一模一样，打算蒙混过关。

毕竟这么做不是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影片中，交通运输部官员家中680克黄金饰品被窃，警局找回失物，物归原主时，官员发现被找回的黄金是假的，去找警察局长理论，局长说：“你的工资每月是6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5000元），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买房子？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挣到这么多钱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报案，浪费司法资源的吗？”面对局长的质问，官员唯唯诺诺，噤若寒蝉。此前，官员夸耀他的房子连装修费用花了7000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587万元）。真黄金去哪儿了呢？实际上，局长抓住窃贼后，命工匠打造了一模一样的假黄金，调包换走了真黄金。有一细节耐人寻味，局长将小偷抓去坐牢，丢给小偷妻子一沓钱，到底是局长咬住小偷去官员家中行窃，还是小偷被抓后，与局长达成同盟，怪不得是。随着故事发展，局长打电话给那些小偷，要他们出面“顶包”，承认去玛哈拉贾家中盗窃垃圾桶的细节。这种社会现实令人心痛疾首，更引发观众对印度司法公正的深度反思。

影片中多次出现了一条眼镜蛇，我特地翻阅了一些资料，影片导演的隐喻在印度，蛇被奉为神明，象征重生、智慧、神秘的力量，同时又有创造和破坏、善与恶、守护和复仇的多重意义。舞蛇文化在印度已有千年历史，表示对死亡和死后重生的敬畏。导演可能借蛇隐喻主人公的复仇之路，冥冥中有神的助力。在我看来，却有一种新的喻义。影片中，蛇和老鼠同时出现在警局被摔碎的瓮中，中国有句成语叫“蛇鼠一窝”，导演是否以此来暗示印度司法体系之腐败呢？

在印度，警察属于公务员体系。英国《金融时报》驻印度记者站主任卢斯写的《不顾诸神》一书中，向读者展示了印度公务员系统普遍存在的渎职、消极怠工、贪腐欺诈等现象。作者发现，在印度百姓与政府接触的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设租、敲诈勒索、贪腐。比如给贫困人口发放的粮食，必须持“贫民证”领取，而要领取这张“贫民证”，你必须向有关人员行贿。而真正需要救济的贫民，由于没钱行贿，得不到救济的粮食，好粮食都被有关官员贪污倒卖了。一些实权部门岗位的公务员贪污所得，可以让家庭在当地鹤立鸡群。如此，影片中交通管理部门要员振振有词，炫耀他的家在这个片区是最耀

告人数总计20人，并非企业法人，聘请了律师，无论是单隐层神经网络模型，还是双隐层神经网络模型，均预测该案件原告胜诉。

文本是法律的表达方式，生成文本是法律领域的核心工作。自ChatGPT面世以来，人们都期待着大语言模型在法律领域的应用，都希望大语言模型可以回答法律问题，完成法律检索和辅助撰写判决书等。然而，现有ChatGPT等通用型大语言模型都没有针对法律领域进行优化，导致给出的回答十分笼统，缺乏专业性，模型所生成的内容有时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但是在法律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为总结，作者对“机器能不能取代法官”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使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机器虽然能学习并模拟法官的法律决策，但法律决策涉及复杂的事实判断、规则判断和价值判断，同时还需要不时根据社会经验和实践理性来创造规则、填补漏洞，因此在众多法律实践中，机器还无法取代人类智慧。当然，机器也并非毫无作为，尤其是在科学立法、法律决策辅助、降低工作成本并提升工作效率等方面可以给法律人作出贡献。

讲故事——叙事、理解叙事，不仅是人类的核心能力，也是法律工作的核心任务。说到底，法律程序就是在重新构建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也就是“故事”。虽然人工智能在判断一个故事的真假方面，还难以与法律实践背后的人类智慧相提并论，但是该书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前景曙光。书中所介绍的具体案例，如基于大数据的判决预测、法系分类，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法律问答、文书生成等，都形象地展示了法律人工智能的丰富应用场景，帮助读者创造性地思考AI时代法律行业的挑战与机遇，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洞悉人性，穿越语言和矫饰，明辨发生于过往的事实，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期盼。

眼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发生的46万多起刑事案件只有一半做了有效处理。这背后，警察的不作为和腐败难辞其咎。有关报道称，印度警察办案效率经常受到公众质疑和批评，即使是杀人命案，都一再往后拖延。案件推到十几年以后再行审理，早已物是人非。司法的公平正义，完全无从谈起。

### 3.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在《不顾诸神》一书中，作者介绍印度公务员无论犯了渎职罪还是贪污腐败罪，都不予追究，甚至都不能开除公职。最大的惩罚，不过是人事调动。而且，公职人员不是竞聘上岗，择优录取，而是按照族群照顾考虑，添加“预留名额”。结果，50%的公务员和公用事业、国有企业公职人员名额，被预留给了各种不同的族群、种姓。这些预留名额，成了各个党派争夺的政治资源。如此进入体制的公务员、警察，又怎能为民办实事呢？

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出现各种严重犯罪不足为奇，尤以女性被强奸和性侵犯罪为甚。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数据显示，2022年记录了32516起强奸案，每天差不多就有90起。

玛哈拉贾巨额悬赏警方寻找垃圾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一位老父亲为被强暴的女儿复仇的决心！2024年6月，《因果报应》在印度本土上映一个月后，印度加尔各答的女医生于夜班期间在医院遭到轮奸和虐待致死。事件发生后，警方和医院给出的死亡鉴定是“自杀”，后来迫于外界压力不得不重新立案调查。8月17日，100万医生自发参加了为期24小时的全国罢工，为捍卫女性权利而奔走。

印度另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是2012年的新德里“黑公交”轮奸案，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在私人营运的公交车上遭到轮奸、殴打、折磨，经过13天的抢救，受害者因伤势过重去世。案件发生后，举世震惊。印度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性暴力”游行。这次，民众呼声让案件半个月就进入了司法程序，6名被告人中的4人被判判处死刑，法院驳回被告人代理律师的上诉请求，判决其不得向印度最高法院上诉。这名受害者的名字也叫“乔蒂”，她被称为印度的“女儿”。

电影是一种艺术，并非与现实一一对应。在印度电影中，无论是家庭、社会分工，女性从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她们仿佛天生就是低等公民，低种姓的女性地位甚至比不上了一头牛。她们在家庭中常常受到暴力对待，也没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直接导致缺乏经济与社会地位。恶的土壤开不出文明的鲜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电影中得到了伸张，但在现实中，一轮又一轮的抗议游行，真能改变印度女性的命运吗？电影的艺术表达，会在现实中找到答案。